

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

陈振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精华和糟粕并存,新见和谬误杂陈。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应当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发展趋势,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是以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体验为立足点的。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及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二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见解或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例如,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趋势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较全面、有根据地概括了二战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

展、新趋势,特别是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历史趋势,较全面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表现形式,不仅肯定当代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而且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危机形式,他们正确地断言,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单面的或畸型的社会。又如,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了科技革命的巨大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看到当代科学技术及应用日益相互渗透、联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现象,特别是指出了在该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控制形式、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这一点,并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特点。再如,在国家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新特征和新变化,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职能、结构和类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形成了较系统的国家理论。他们的某些看法,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大大加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与实质,福利国家批判等等是有可供借鉴之处的;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日益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偏袒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国家的自主性等,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在阶级问题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阶级阶构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如注意到了白领阶层的迅速扩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对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新形式等。这对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及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有致命的

弱点,分析这些缺陷及失足的原因,也可以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有益的教训。例如,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及60年代末以后的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定程度分析,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社会批判的重点并不是它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该社会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及社会心理。这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独特性和力量之所在,又是这一批判的失足和虚弱之处。这种虚弱性就在于,他们并未在总体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而是因这个社会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特点而断定其社会性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了;他们不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放在首位,反而用对这一社会的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批判来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对时代所提出的某些重大的且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有挑战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未加以认真研究,反而借口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失足之处,我们可以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陷入资本主义认识的误区。

2.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批判苏联模式(即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在这两种批判的基础上探索西方社会主义变革及“新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问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社会主义观。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在总体上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在西方实现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设想。因此,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沉痛教训,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坚定不移地

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适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将前苏联的现实与马克思的理论加以比较,“发现”前苏联的现实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相符合,前苏联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他们批评苏联模式的设计过于狭隘,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只强调政治上的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的性质,片面强调经济方面的革命,忽视思想领域和心理领域的革命;强调人消极服从纪律,忽视人的创造性以及人的自由解放;他们抨击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它是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而且在前苏联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阶级。他们还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为现实辩护的、丧失了革命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前苏联和西方社会当作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来加以批判,甚至将苏维埃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是有重大失误的,他们贬低或否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及这些经验在西方革命中的普遍性,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否定列宁、斯大林等人建立和领导的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了前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将它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没有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等等。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包含一些合理的、值得借鉴的因素,如揭露、批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共产国际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强制推行一种革命模式的做法及其危害;指出了列宁之后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集权、党政不分的本质特征以及片面强调计划,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以及片面强调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和

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纪律、集中而忽视自由和民主等方面的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公有制(国有化)与人民当家做主、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于我们总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吸取苏联、东欧演变的深刻教训,理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途径、道路和策略、西方革命的主体与动力、“新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蓝图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等,形成了所谓的“新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种选择,要点是选择适应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革途径和革命新策略,依靠革命的新主体,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显然,在“第三条道路”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近乎于乌托邦的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们的理论中也有某些合理因素,如提出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制定革命的新策略,关于西方革命的主体及革命斗争的方式变化问题,关于思想文化革命、意识革命及掌握这方面领导权的重要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关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问题等等都有可供参考之处。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及

其规律性,了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长期性、曲折性,坚定社会主义最终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从世界视野中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归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们的一个共同口号是“‘重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他们的理论也往往被贴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它的各种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比重有多大,这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着很大距离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的对立以及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进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不是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学说。他们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历史决定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都“过时”或“失效”了,必须加以“重建”,用他们的“新”理论来取而代之。很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总体上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但是,尽管如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提出和研究的许多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枝节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基础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世界观、本体论,抑或仅仅是一种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与自然、自然观与历史观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过程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他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关系如何?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及其后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还是一种批判方法?应当如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这些问题。尽管他们给出的答案未必是正确的,但毕竟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他们的解答也具有参考价值。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框架,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要求用当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和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因素来丰富和充实历史唯物主义,并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多视角的研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某些新课题(如对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交往行为与理解行为等的研究);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往往能够采取比较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往往能得出一些合理或可取的见解。例如,卢卡奇关于物化和阶级意识的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观点;科尔施、葛兰西及卢卡奇等人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机械论的批判,

强调意识能动性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对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萨特等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批判;阿尔都塞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普兰查斯的国家和阶级学说等,都包含有某些正确的理论成分。对这些合理因素的提炼,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应做的一件工作。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出发,最终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他们失足在哪里以及如何失足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少走弯路,避免在理论上重蹈覆辙。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卢卡奇作为一个典型来加以解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写作愿望是为了将当时的革命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然而却赋予这些马克思主义命题以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主义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终在客观上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卢卡奇后来对《历史和阶级意识》错误的认识和自我批评以及某些方面的克服,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薛晓源)